

SESSION 2013

---

CAPES  
CONCOURS EXTERNE  
ET CAFEP

Section : LANGUES VIVANTES ÉTRANGÈRES  
CHINOIS

COMMENTAIRE DIRIGÉ EN CHINOIS

Durée : 5 heures

---

*L'usage de deux dictionnaires unilingues en langue chinoise (Xinhua Zidian et / ou Xiandai Hanyu Cidian) est autorisé.*

*L'usage de tout ouvrage de référence, de tout autre dictionnaire et de tout matériel électronique (y compris la calculatrice) est rigoureusement interdit.*

*Dans le cas où un(e) candidat(e) repère ce qui lui semble être une erreur d'énoncé, il (elle) le signale très lisiblement sur sa copie, propose la correction et poursuit l'épreuve en conséquence.*

*De même, si cela vous conduit à formuler une ou plusieurs hypothèses, il vous est demandé de la (ou les) mentionner explicitement.*

**NB :** *La copie que vous rendrez ne devra, conformément au principe d'anonymat, comporter aucun signe distinctif, tel que nom, signature, origine, etc. Si le travail qui vous est demandé comporte notamment la rédaction d'un projet ou d'une note, vous devrez impérativement vous abstenir de signer ou de l'identifier.*

## Commentaire dirigé

### 请围绕五四精神评论胡适的这篇文章

####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

作者：胡适

五月五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张熙若先生的《国民人格之修养》。这篇文字也是纪念五四的，我读了很受感动，所以转载在这一期。我读了张先生的文章，也有一些感想，写在这里作今年五四纪念的尾声。

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纠集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张熙若先生“雪中送炭”的文章使人颇吃一惊。他是政治哲学的教授，说话不离本行，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

他充分承认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有缺点和流弊，尤其在经济方面。但他指出个人主义自有它的优点：最基本的是它承认个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来源。他又指出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神髓是承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说：

“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及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流弊，但以个人的良心为判断政治上是非之最终标准，却毫无疑问是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的最高价值。……至少，它还有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的好处。此种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除过与此种人格根本冲突的政制）都是有无上价值的，都应该大量的增加的。……今日若能多多培养此种人材，国事不怕没有人担负。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

张先生的这段议论，我大致赞同。他把“五四运动”一个名词包括“五四”（民国八年）前后的机关报思潮运动，所以他的文章里有“民国六七年的五四运动”一句话。这是五四运动的广义，我们也不妨沿用这个广义的说法。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我们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就感觉到当时的“新思潮”“新文化”“新生活”有仔细说明意义的必要。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

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独秀和钱玄同等等时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言行录》页二二九）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我们在当时提倡的思想，当然很显出个人主义的色彩。但我们当时曾引杜威先生的话，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

（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

（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这后一种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张熙若先生说的“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

近几年来，五四运动颇受一班论者的批评，也正是为了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平心说来，这种批评是不公道的，是根据于一种误解的。他们说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这是滥用名望的大笑话。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了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用不着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了吗？难道当时艰苦奋斗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志士仁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奴才吗？我们试扯苏俄现在怎样用种种方法来提倡个人的努力（参看《独立》第一二九号西滢的《苏俄的青年》，和蒋廷黻的《苏俄的英雄》），就可以明白这种人生观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了。

还有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

克思、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我们如何配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呢！

所以我完全赞同张熙若先生说的“这种忠诚勇敢的人格在任何政治下都是有无上价值的，都应该大量的培养的。”因为这种人格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欧洲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我们现在看见苏俄的压迫个人自由思想，但我们应该想想，当日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受监禁拘囚的十万革命志士，是不是新俄国的先锋？我们到莫斯科去看了那个很感动人的“革命博物馆”，尤其是其中展览列宁一生革命历史的部分，我们不能不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张熙若先生很大胆的把五四运动和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相提并论，并且很大胆的说这两个运动走的方向是相同的。这种议论在今日必定要受不少的批评，因为有许多人决不肯承认这个看法。平心说来，张先生的看法也不能说是完全正确。(……)但就大体上说，张熙若先生的看法也有不小的正确性。孙中山先生是受了很深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由主义的影响的，他无疑的是民治主义的信徒，又是大同主义的信徒。他一生奋斗的历史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爱自由，爱独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看他在民国九年一月《与海外同志书》(引见上期《独立》)里那样赞扬五四运动，那样承认“思想之转变”为革命成功的条件；我们更看他在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时那样容纳异己思想的宽大精神，--我们不能不承认，至少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国民革命是和五四运动走同一方向的。因为中山先生相信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转变”，所以他能承认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的事”。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

载《独立评论》1935年5月12日150号

## ANNEXE 1

【胡适】（1891~1962），现代诗人、学者。原名嗣糜，学名洪骅，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人家庭。幼时就读于家塾，习四书五经。9岁起熟读多种中国古典小说。1904年赴上海，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等校。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杜威，深受影响。1917年完成博士论文（1927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要从“八事”入手，首次猛烈抨击封建文学，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首篇正式宣言，为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引起很大反响。嗣后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论文，把白话文学提到“中国文学之正宗”的地位，这是文学观念一个大变革。他提出文学革命要创造一种“活的文学”，即“国语的文学”。这对于开展文学革命和创建新文学，起了重要的倡导和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发表《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有关创作的论文，率先发表白话文学的创作。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写成了一种解放了的新诗体，另外，他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他还写了许多自然畅达的传记作品和杂文，翻译了都德、莫泊桑、易卜生等的一些世界名作，以供创作新文学的借鉴。在学术上，他曾致力于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工作，其中所著的《红楼梦考证》，否定了索隐派的旧红学，开创了《红楼梦》研究的新红学派。在治学方法上，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学术界深有影响。所有这些，使胡适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略）

## ANNEXE 2

### 历史的五四（节选） 商金林



## 五四精神的阐释

对五四运动的解释不一，以及各自的立场不同和认知的差异，再加上时代的影响，五四精神的阐释也精彩纷呈。

罗家伦在 1919 年 5 月 26 日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为“三种”：第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并三呼万岁：“学生牺牲的精神万岁！”“社会裁制的精神万岁！”“民族自决的精神万岁！”

张东荪在 1919 年 5 月 27 日发表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一文中将“五四运动”精神概括为“雪耻除奸的精神”。

傅斯年把“五四精神”说成是“北大的精神”。他在 1919 年 9 月 5 日撰写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

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发作。社会上对于北大的空气大改变。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在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

太空在《五四运动之回顾》中第一次把“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民主”精神：五四运动的动机，就是山东问题，外交问题；但是说到五四运动的精神，决不如如此单简，五四运动的精神到底什么？就是发挥“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精神，拿出最大的努力，斩断奴隶索子，打破黑暗势力，创造我们的新生命！

罗家伦的“三种真精神”说、张东荪的“雪耻除奸的精神”说、傅斯年的“北大的精神”说、太空的“‘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精神”说，代表着当年人们对五四精神的界定和理解。而所谓“北大的精神”，大概也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当年倡导并凸显出来的“思想自由”的原则，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的精神，以及“内图个性的发展，外图贡献于人群”的新信仰。类似的观点一直延续到 1920 年代末。1928 年，叶圣陶创作的长篇《倪焕之》第二十章专写五四运动，书中将五四精神归纳为青年的“自己批判的精神”、“怀疑”精神、嗜尚“西洋的学术思想”的精神、“德谟克拉西”的理想等。

1930 年代人们对“五四”精神”有了新的阐释，郁达夫的阐释颇具代表性，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

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觉。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

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

1940年代五四运动成了研究的“热点”。毛泽东的《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发表后，五四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成了评价五四运动的准则。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规定“五月四日为青年节”。1945年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七届年会定5月4日为文艺节。1949年12月23日，中国政府政务院正式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郭沫若1941年在为“五月四日为青年节”写的《青年哟，人类的春天》中说：

我们把“五四”定为青年节，也就是这种意识觉醒的明白表示了。我们希望：“五四”运动时所表现的那种磅礴的青年精神要永远保持下去，而今后无数代的青年都要保持着五四运动的朝气向前跃进。继承“五四”，推进“五四”，超过“五四”。使青年永远文化化，使文化永远青年化。

沈从文在纪念五四的一系列文章中均谈到“五四精神特点是‘天真’和‘勇敢’”。杨晦在《追悼朱自清学长》一文中说：“五四”时期“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五四’时代的青年都有一种朝气，一种冲劲，以一种‘冲决网罗’的精神，跟中国的古老社会决裂，甚或宣战”。郭沫若在《“五四”课题的重提》一文中说：“‘五四’运动的课题是接受赛先生（科学）与发展德先生（民主）。这课题依然是一个悬案。”“我们今天的任务，依然要继续‘五四’精神，加紧解决我们的悬案：接受科学并发展民主。”“今天要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要做到这一层，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为前提”。在《学术工作展望》中他再次谈到五四以来的课题：实现科学与民主，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学术工作者亟待解决的课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9年5月5日第8版